

# 经济人假设:共和主义传统的反思与主张

万绍红

(江西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13)

**[摘要]** 经济人假设认为,无论是个体还是政府机构都是追逐私利、实现自我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和经济动物。这种假设的结果是政治冷漠、公权腐败、市场失范。共和主义反对经济人假设对政治领域的入侵,反思经济人假设的合理性及其带来的公地灾难问题。共和主义主张超越经济人,发展责任型政府。在政治人假设的基础上,共和主义主张公众积极参与政治,政府积极回应民众的偏好,社会协商。共和主义区分公共品和公共服务的类型,主张市场机制与政府力量相互配合,积极促进公共品的供给与社会公平正义的保障。

**[关键词]** 经济人假设;共和主义;政治人;公共品供给;公共利益

**[中图分类号]** D0-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73(2014)06-0021-07

## 一、问题的提出

经济人是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假设,经济人假设每个人都是追求物质利益或者自我目标最大化的理性人。按照此假设,在现实社会中,经济人都能够有效地运用自己的理性实现自我利益的最大化。在琳琅满目的商品和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中,现代人被化约成了一个冷漠的消费者和纯粹的经济人,并沉浸其中,不能自拔。被共和主义视为有机联系的社会人、政治人成了本性上自私自利、相互竞争的原子化个体。曾经被共和主义视为荣耀自身和家族的公共职位成为纯粹以金钱和物质利益计算的谋生手段。曾经独立于大众,并与尘世生活保持一定距离的伦理追求成为虚伪的做作、傲慢或者不怀好意的阴谋。利益集团、压力集团、“院外活动集团”成为了现代政治的合法组成部分而被人们广泛接受。<sup>[1]311</sup>

“边际革命”和马歇尔经济学的盛行,经济学与政治学的分道扬镳,效率与收益成为了公共组织最基本的“善”,经济绩效成为政治合法性的唯一利器,资本主义塑造了商业自由主义在政治和经济上

的合法性。公共行政本应该是“为谋求实现公众的社会价值观而对社会变革进程的管理。”<sup>[2]</sup>但是,今天在许多国家,公共行政自身已失去控制。我们对政治生活的控制感越来越弱,我们外表冷酷内心孤独,我们不再热衷公共生活,我们宁愿呆在家里看电视或者独自去打保龄球。<sup>[3]</sup>帕金森定律和拜金主义盛行于世,社会责任成为“营销诱饵”,政治机器被利益集团绑架,“塔西佗陷阱”无处不在,政治正在被终结。

## 二、经济人假设在政治领域中的应用: 共和主义传统的评估与反思

作为一种古老而流传深广的政治理论,共和主义来自古典时代,渊源于光荣的古希腊雅典与伟大的古代罗马共和国,在现代得到复兴和重构。共和主义的复兴并不是某些学者建构出来的概念,不是为了智识上的时髦而重构的范式,<sup>[4]</sup>是为了应对商业自由主义给社会带来的危机而进行的严肃思考与实践实验。共和主义植根于西方国家丰富而成熟的政治实践之中,温和与持重是它的重要特征。虽然共和主义不如自由主义等所谓纯粹的政治理论锋芒毕露,但它总是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被人们

**[收稿日期]** 2014-05-17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方共和主义公共利益理论研究”(11CZZ006),江西省社科基金“政治制度、文化、经济发展与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14Z01),国家留学基金面上项目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万绍红(1974—),男,江西进贤人,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博士、天津师范大学政治学博士后,硕士生导师。

记起、被人们复兴、被人们重新解读建构,以应对那些“纯粹的政治理论”给人类生活带来的问题和麻烦。

共和主义否认纯粹经济人的存在,政治人假设是共和主义最基本的假设。共和主义认为,政治人通过参与公共事务获得孤独个体在私人领域无法获得的比较物质收益,并在政治生活中获得认同感与归属感等方面的精神利益。在这其中,共和主义认为社会贤能、政治精英的政治性更强,他们对政治绩效的激励更敏感,在他们的榜样示范作用下,通过人群的共生效应,整个共同体的需求结构获得提升。换言之,社会贤能、政治精英的人生目标并不是狭隘的物质利益或者自我目标的实现,而是推动社会的发展,享受社会的表赞,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正是在此逻辑前提下,共和主义承认美德政府的存在与公共权力为人民服务为公共利益服务的可能。

在经济人的驱动下,现代社会成为了一个丰裕的社会,公司化的社会,消费资本主义的社会。现代政治抛弃了古老的政治人假设,在经济人假设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了自己的理论大厦和实践方向。在经济人假设的强大磁场影响下,现代社会中的民主政制也被改造成了所谓的自由民主政治,对民主的界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民主的合作方面被弱化甚至忽视,民主的个人意志主张与选择权利层面被扩大。自由主义认为,公共权力的范围就是保障个体在政治市场的自由竞争。民主政治的运行规则就是市场经济的规则在政治中的运用。因此,民主就是竞选,就是投票,就是成本收益的算计。

我们忘却了在个人的物质追求和利益关系之外人类还有更崇高的政治价值目标和更本真的社会关系。我们忘记了在促进资源配置最优化、促进社会生产最大化、满足个人物质偏好的同时,还需要关注永恒的正义问题和“自由市场的坠落问题”。我们忘记了日益网络化、全球化的复杂社会,每个人的利益和他人的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对公共事务的冷漠就是对自身利益的漠视。我们有必要质疑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和市场经济的合法性,而不是仅仅研究狭隘的公司治理与生产技艺问题。

在公共选择理论把经济人假定引入政治领域后,政府行动与政治决策的就变得复杂。在共和主义政治理论中,国家被视为公共利益的代表,国家将所有个人的利益统一起来,并致力于社会福利的最大化。<sup>[5]</sup>也就是说,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目标是既

定的,政府与政治家是大众利益的受托者与决策者,关键在于如何通过公民美德塑造与制度体系构建来实现此目标。但是,当政治家被假设为经济人以后,公地灾难频发,政治成为了“政治家、投票人、利益集团、官僚”博弈的战场。任何政治行动或者政府行为都被视为逐利的行为,或者企图逐利的思想。在“经济人假设”引入政治领域后,公共决策的可能性与公正性就受到怀疑,甚至公共决策的目标也就变得虚无,公共利益因而成为一个难题。

塔洛克从生产效率和再分配效果两方面否定了政治组织的积极行动,他强调公司的经济效率优于政府机构,即使公司是按等级制组织起来的,其效率也优于官僚机构。再分配表面上看是政府的一项高尚、正义活动,其实大多数转移支付不是给了穷人而是给了那些有良好政治组织的群体。因此塔洛克认为,任何形式的政府再分配计划都是不值得提倡的,或者是令人生疑的。<sup>[6]</sup>唐斯的观点与此类似,他认为社会的强势力量生产者比消费者更容易影响政府的公共决策,有财富优势的富人、有影响力的专家更容易影响政府的分配方案。<sup>[7]216</sup>塔洛克和唐斯在怀疑政府干预效果的时候,犯了一个片面化的错误,既然在再分配的过程中,强势集体会借助自己的力量使再分配向自己倾斜,他们当然也会在市场生产的领域利用自己的强势为自己谋取垄断性利润,这又对所谓的自由市场逻辑提出了挑战。

按照斯密定理的逻辑,市场的规模越大,市场分工就越充分,劳动生产率就越高,经济增长就越快。亚当·斯密认为,在自由市场上,自利的人们尽情追求自己的个人利益,通过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公共利益就会被撬动起来,而且比人们有意追求的公共利益效果更好。利益集团范式和“特殊利益政治学”意图在供给—需求,成本—收益的框架下,通过政治市场内的自由博弈促使各利益集团平衡,在最大化各利益集团利益的同时,生成均衡、稳定的社会秩序。同经济市场的所谓自由竞争一致,在政治市场,利益集团范式的结果必然是分利集团和寡头垄断的产生。

塔洛克对再分配效果的忧虑与唐斯的强势集团占优思想正是共和主义者思考的问题,即共和主义反对、利用的利益集团问题。联邦党人认为利益集团是可以利用的,通过利益集团相互之间的竞争,形成一种平衡,从而为社会的公共利益目标所用。古典共和主义则强调利益集团是社会腐化的体现,要通过公民教育的方式激发公民美德,通过

共和主义的法治体系预防与惩罚利益集团的分利行为。

包括公共选择理论在内的理性选择政治分析是以经济人假设和效率为标准的,但在政治分析中过分关注效率标准不具有正当性和合理性。经济人假设贯通市场决策与非市场决策的意图忽视了政治领域的特殊性。在政治领域中,很多政治制度最初的设计动机可能是非效率的,例如正义与平等、公共利益。<sup>[8]</sup>新制度主义反对公共选择理论制度不变的假设,它认为制度是个需要认真对待的变量。必须强调经济绩效、政治行为与政治制度的相关性,研究政治行为需要研究政治行为背后的宏观政治制度。政治制度可以成为约束、控制、改变经济人的预期与行为。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历史制度主义与社会学制度主义强调个人利益的观念与形式并不完全是理性选择的行为,是各种社会文化、组织、制度结构相互建构的产物。历史制度主义反对“理性经济人”假设,坚持“文化人”的立场,社会学制度主义则认为人在其本质上是社会的,其行为受制于社会的传统与习俗。“在选民或政治家的个人行为背后,可能经常存在超越个人利益的意识形态,对于政治和合法性的理解以及关于经济政策后果和政府作用的特殊看法。”<sup>[9]</sup>

面对经济人的基本假设以及经济学思维在政治领域的应用,公共选择理论的代表性人物布坎南从内部进行了一定的反思。布坎南承认个人是惟一有意义的决策单位,个人的动机是效用最大化。但是“群体”确实作为某种不同于个体成员的东西而存在着。布坎南指出,从个人主义的角度来说,公共利益的函数完全由个人决定。换言之,在群体中有多少个人就有多少社会福利函数。因而,公共利益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如果从群体的角度来说,依据帕累托标准,那些得到群体一致支持的变化就是公共利益,因为通过这种方式没有任何人的利益受到损害。<sup>[5]311</sup>布坎南认为,激励个人的考虑有许多,明显极端化的假设将严重限制假设的描述价值、解释价值和预测价值。<sup>[5]323</sup>布坎南“发展了经济和政治决策的契约论与宪法基础”。他提出,所谓的自由市场及其效率是规则约束和制度保障的结果。在批评经济学的根本假设的基础上布坎南肯定了制度,尤其是宪法、社会组织、公共利益的存在重要性与必要性。需要强调的是,宪政经济学并不把制度看成是简单的制度安排,也不仅是这些制度安排之间形成的互补关系,它认为制度是一个立

体结构,在这个结构的上端,就是宪法。一句话,宪政是制度中的重中之重。它是生成制度的制度,是规则的规则,是元制度,元规则。<sup>[10]</sup>尤其需要提出的是,布坎南在强调制度约束的同时还强调了道德的约束。

布坎南和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对经济人假设思维及其在政治领域中的应用的反思和共和主义的立场是内在一致的。桑德尔强调市场的政治控制和道德约束。共和主义从人的政治性基础出发,肯定道德的作用,在公民美德基础上,共和主义建立了自己独特的宪政理论,一种和自由主义相区别的宪政制度。共和主义的宪政制度是管理主义与自由主义宪政主义之间的一种平衡,它既是一种限权的技术、利益协调的工具,是人们追求个人利益和幸福生活的边界,也是公共权力合法性与权威的保障,是政治精英为公共利益和社会福祉服务的平台。共和主义的宪政体制不是利益集团表达自身利益、进行政治分赃与统治的工具,是社会表达和追求公共善的平台。

新公共管理理论以经济人假设、理性行为假定为基础,引入经济学的思维和方法来处理公共事务问题,在公共事务的处理技术层面上具有一定的意义,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尼古拉斯·亨利称之为私有化政治学。他认为,政府选择让私营公司承包公共服务是由政治的灵活性决定的,这种方法可以精简政府机构,提升政府行为的效能,促成真正的政府责任心。<sup>[11]</sup>但是经济学本质上的逐利性与公共事务管理的非盈利性和政治性、社会性是矛盾的,公共事务在本质上不能用成本—收益模型来解释、处理。经济学也需要重建政治经济学的传统,建立政治学和经济学相统一的系统,不再无视政治结构的复杂性或者假定政治制度为不变的给定常量,不再仅仅埋头于狭隘的微观经济现象和所谓的边际研究,还要关注复杂的政治社会问题;不仅仅要考虑政府运行的成本问题,还需要考虑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公民的沟通问题,政府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激发与促进共和主义倡导的共同体建设,帮助公民实现自身的价值,而不仅仅是发展向公民“推送”面包的消费主义。

最后要提出的是,共和主义不反对自由市场,恰恰相反,共和主义把市场经济作为改善人们生活,保障人民自由,增进公共利益的重要工具。经济共和主义强调经济领域的共有、共治、共享。但是共和主义反对自由市场逻辑即经济人思维对政治领域的入侵。权力市场化就是经济人思维在公

共领域的现实表现。公共选择理论和利益集团理论就是经济人思维在政治领域扩张势力范围的结果。在此思维下,人们认为政治和市场的运作都遵循相同的自由竞争原理,他们认为政治就是利益主体的博弈,人们尤其是公共权力要尊重政治的市场法则,不能够人为地对之进行干预。

经济人假设以及经济学方法在非市场决策中的应用为现代政治决策注入了新的血液。现代共和主义修正政治人假设,肯定人的自利性,利用社会不同部分之间的逐利冲动维持共和主义政体平衡,实现共和主义公共利益的思维和公共选择理论是相通的。古典政治忽视个体之间的差异,固然节省了政治决策的成本,实现了所谓的公共利益,但实际上忽视或者压抑了个人的正当利益诉求,因而这样的公共利益事实上并没有体现其中的公共性。公共选择理论认为,人与人之间不是统一性的存在而是差异性的存在,只能以个人为单位感受成本和收益,这是经济学理论得以成立的前提,也是政治理论必须正视的现象。对于这样的个人来说,他们之间的利益是相互冲突的。因而,我们的关注点在于如何通过交易或者交换的机制来消解或者控制这种冲突。

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和政治学的现实主义人性假设在某种程度上是契合的,但是任何极端的假设都是在经验上无法证实的。唐斯强调“理性人的经济学定义仅指这样一种人,他们在自己知识的限度内,运用每单位有价值的产出的最少的稀缺资源投入来达到自己的目的。”<sup>[7]4</sup>一个理性人是按如下方式行为的人:第一,当面临一系列的可选方案时,能够做出决定;第二,可以根据自己的偏好顺序排列可选方案;第三,偏好顺序是可以传递的;第四,总是选择在偏好顺序中位置最高的可选方案;第五,面临同一选择时总是做出同一决定。<sup>[7]5</sup>唐斯对古希腊以降的自然政治观和共同体学说提出挑战的同时提出,极端个人主义的假设也不合理,联盟和社会团队是客观存在的。而且,在现实中,人们并不总是表现为自私自利的,“理性人在某种程度上受到独立于他们的短期得失的社会责任感的促动。”<sup>[7]228</sup>“自我节制的善常常是个人收益的一个丰富源泉”。<sup>[7]33</sup>“利他主义者存在于受到尊敬的英雄中间。”<sup>[7]24</sup>官僚化官员以及其他社会代理人“一般都有一系列复杂的目标,包括权力、收入、声望、安全、个人舒适,对理念、机构或者国家的忠诚,卓越工作的骄傲感,服务公众利益的渴望。”<sup>[7]2</sup>当狭隘的理性选择模型坚持人们不会自愿对公共产品的提

供作出贡献时,赫希曼却发现成千上万的人多次作出过这种贡献,并且通常自己承担很高的成本。<sup>[12]</sup>换言之,理性经济人模型只是一种逻辑的精致推演,并不能精确地描述现实。

帕累托认为,经济学受理性行为逻辑支配,只是与自然科学的理性秩序相类似罢了。没有任何理由希望具有科学本质的逻辑行为将支配一切,而经济行为中的或然性将永远立于不败之地。<sup>[21]433-434</sup>在对亚当·斯密和马歇尔、凯恩斯、阿罗经济学的研究基础上,1978年西蒙修正了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提出了“有限理性”概念。他认为人根本没有能力成为完全的理性人,人是介于完全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有限理性”状态。这一修正实质上颠覆了经济人的假设基础。西蒙发现人类并不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动物,人们追求的是适度的满足,人类是追求组织认同并且能够做出利他行为的,因为认同和利他提高了人们适应社会的能力,是符合人们的有限理性假设的。<sup>[13]</sup>

### 三、超越经济人:新公共服务理论与共和主义

以经济人假设为基础构建的自由市场理论在给个人带来自由的同时,其内在的个人主义也给我们的公共生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指出个人主义使公民们不断疏离公共生活而沉迷在自己的狭小空间里,赖克则在《超级资本主义》中提出超级资本主义使人们沉溺在无尽的利润活动追求之中,于是公益工作都被甩给政府,政府的权力因而越来越集中,公共领域越来越狭小。在市场领域,自由市场强调政府的“无干涉”,其结果是贫富分化、资源浪费。佩迪特强调政府对社会的适当干预。佩迪特区分合法性与正义概念的不同,他认为:“正义是指政府干预的秩序是否是正义的、可接受的、需要的。合法性是指政府对社会秩序的干预是否是正义的、可接受的、需要的。”<sup>[14]</sup>佩迪特的结论是人们对合法性的不当理解是受到自由主义不干涉主义影响的结果。<sup>[14]</sup>

新公共管理理论秉承经济人假设,信奉市场机制和“效率主义”,主张“顾客导向”,政府只应在公共利益的实现机制中承担“掌舵”的角色。奥斯本的企业家政府理论认为要按照企业的形式和市场的精神重塑政府,用“企业家精神”对抗“官僚主义”,政府要把公民当消费者,政府的工作要以消费者的需求为导向,政府的工作要充分考虑成本收益性。<sup>[15]</sup>登哈特的新公共服务理论批评了新公共管理

理论的个人利益需求导向和公共利益虚无主义。新公共服务理论指出,强调公民不是顾客,不是单纯的消费者,公共管理者也不能够比拟为纯粹的企业家。政府的目标根本上不同于企业,政府的角色在于确保公共利益居于支配地位。登哈特批评传统官僚制不重视行政官员积极性的原则,而倡导公共行政官员与公民、各种团体组织的积极互动,一起去努力“发现和明确地表达一种大众的利益或共同的利益并且要促进政府去追求那种利益。”<sup>[16]</sup>新公共服务理论结合新公共管理理论与传统行政管理理论,反对没有价值立场、过分强调技术和效率的官僚主义、管理主义、科学主义,重新主张公共行政的重要价值观,包括公民身份和公共利益,<sup>[17]</sup>强调公共组织的目标是追求社会公共价值。可以发现,在其理论实质上,新公共服务理论和共和主义如出一辙。

建立在新公共服务理论和治理理论基础上的公共价值管理理论主张政治的作用,他们认为公共管理者应该创造公共价值,保障公共利益,而不是单纯迎合民众个体的偏好。公共价值管理理论强调公众积极参与政治,政府回应民众的集体偏好,主张建立开放型的、网络化的、灵活的公共服务获取和政治意见递送与反馈机制。公共价值管理理论蕴含着丰富的民主内含,也对管理者的价值引导和社会价值创造提出了更多的期望,他们对待公共价值或者公共利益的内容是开放性的、是随着情境不断发展变迁的,而不是绝对的。

现代共和主义在肯定政府与各种社会组织之间的对话和相互合作的基础上,强调政府的“掌舵”和责任,主张发展共和主义所需要的“官僚主义”,更主张精英、领导阶层在共和国繁荣和公共利益上的“企业家精神”。共和主义主张公共利益并不是私人利益之间的平衡,政府要尊重民意,而不能够奉行单纯追求效率与利益的管理主义,要保持公共政策的可论辩性与回应性,还需要变革社会,追求超越性的价值,过一种良善的生活。

新公共服务理论与公共价值管理理论超越了经济人假设带来的公共利益虚无主义与个人利益至上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新公共服务理论,尤其是公共价值管理理论的主张及其探求公共利益的思路与共和主义是十分契合的,但是共和主义的传统比之更加悠长、深刻。共和主义强调政治绩效,更主张共和主义的价值立场。共和主义蕴含着丰富的民主意蕴,强调政治的回应性、代表性、透明性,又对民主的内在弊端进行了制度化的过滤。共

和主义既强调制度规范的作用,又强调政治精英、公共行政机构的主观能动性。

#### 四、共和主义的公共品供给 思想与公共利益主张

在共和主义不仅是强调公共精神的政体模式,还是决定公共生活方式和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的政治模式。公共品是典型的公共利益所在,在反思经济人假设的基础上,共和主义强调人的政治性。共和主义要为全社会的公民提供公共福利,要造就整个国家的繁荣与强盛。共和主义否定市场机制在公共利益问题上的“自发机制”,提防单纯市场机制的内在风险,突出政府与公共论坛的“衡平”作用。共和主义反对公共品供给上的极左利维坦主义,也反对公共品供给的极右私有化主张。

按照共和主义的公共利益理论逻辑,纯粹的私人品政府不应干涉,应该依靠纯粹的市场力量和社会自治组织内在的力量。由于个体内在禀赋的差异,政府的关注点是促进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引导社会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促进个体比较优势的发挥和共同利益的帕累托改进。纯粹的公共物品,如国防、法律、基本制度框架,最低生活保障、科教文卫、灾害救助;具有积极外部性、不适合采用盈利性模式运作的公共物品,如公共卫生和教育应该由政府提供。政府还应该界定产权,减少代理成本和交易成本,避免租值耗散,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促进就业,保护环境、维护人类生活的自然条件,促进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涉及国家安全、国内治安,甚至自然垄断的公共品应该由政府主要是联邦或者中央政府控制,因为这些公共品关涉国家自由,是绝对不可以由私人保安代理等市场力量来提供的。因为政治机体如果委托他人来保卫自己,就会威胁到我们的自由和生命安全。<sup>[18]</sup>

单独的市场机制并不能够提供公民自由所需要的一切公共品,甚至市场本身恰恰会成为人们奴役的根源。如住房问题的解决单纯依赖市场机制是无法保障民众的基本生活条件的,政府应该承担起民众对住房的最低生活要求保障责任,超过最低生活需求的可选择性要求则可以由市场进行选择。这是由共和主义内在的差异性、卓越性所决定的。共和主义的公共利益理论既要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又要创造条件让民众能够追求超越性的价值。

按照公共品与人们生活的密切程度区分,与人们基本权利密切相关的产品,由政府保障,涉及人们扩展权利的产品可以交由市场或者社会供给。

准公共品、混合公共品可以采用政府与市场合作的方式提供,如环境治理,在具体操作上使用 BT 与 BOT。与全球性公共品、全国性公共品、跨地区公共品相区分的区域性公共品和地方性公共品则可以由地方政府或者地方性社会组织单独或者合作提供。

由于公民个体自主能力的增加和社会能量的增长,就其总体而言,现代社会的治理对政府与公共权力的依赖越来越少,对市场和市场化机制的使用越来越成熟,越来越频繁,越来越依赖营利和非营利组织的合同治理,现代国家越来越从权威国家走向协议治理国家。<sup>[19]</sup> 哪怕这些非政府组织(NGOs)自身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他们仍然相信依靠非政府组织本身的力量可以克服这些问题,而不是依赖政府的介入。<sup>[20]</sup> 但是,无论如何,公共利益是这些受托私人部门的重要目标。<sup>[21]</sup> 作为超越平等公民和社会组织的政府仍然是公共品供给和公共利益监管最后的力量。共和政府还可以通过共和原则的发挥,促进社会各主体间的协作和有序竞争。

以汉密尔顿为代表的美国共和主义者试图通过多级政府的协作增加联邦总体的利益。这种协作性的联邦主义的基础是通过政府间的协议共同提供公共产品、管理公共服务。这种协作在共和主义政制下是可能的,因为在这种政治体制下任何一方都不能控制对方,各方在互相容忍当中都会有一种明显的、可感觉到的共同利益。<sup>[22]</sup>

竞争可能是生产性的,也可以是破坏性的。由于规模不经济、自然垄断的部门或者行业的存在,这些部门或者行业的竞争可能导致社会资源的浪费或者市场秩序的混乱。而且,“随着大规模生产的出现,竞争也变成了一种破坏性力量。”<sup>[23]</sup> 针对竞争造成的社会分化,在现代具有重要影响的自由主义者罗尔斯则强调社会价值应该平等的分配,政府及其公共政策要体现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只有这样才能照顾全社会的整体利益或者说公共利益。政府应该对财富分配的不平等进行干预,提供社会保障品,供给社会正义,尤其是保障制度的正义性。因为自由的主义的所谓平等竞争只会导致结果的不平等,当然罗尔斯的社会福利主张只是一种有限福利,不能等同于福利国家的主张。在最低社会保障,有限福利主张方面,在重视制度供给责任方面,共和主义和现代自由主义者罗尔斯是一致的。

共和主义的“正义论”提出,公正的准则包括不伤害他人和有利于公共利益。<sup>[24]</sup> 这是现代共和主义

的基本权利理论,任何人都拥有获得基本人权的保障,任何权利的主张,包括私有财产权不得损害他人的基本人权。按照潘恩的理论,人们组成社会的目的是为了保障自己的生命、自由和财产等个人利益,共和政府是为了个人和集体的公共利益而建立和工作的政府,政府必须要积极和社会合作,实现自己的职责。<sup>[25]</sup> 国家既要保护个人的私有财产,还要积极作为,让每个人根据公平的法权和公平的审判拥有自己的财产,同时又要保障社会贫困人群的基本生活。

总之,共和主义传统的公共利益理论主张建设责任型政府,发挥政府在公共利益上的主导作用。政府在公共利益上的积极作为与期望与共和主义的政治人假设密切相关。积极的政府假设赋予“政治的”或混合型的政府更加宽广和多样的公共品供给权利和平衡社会正义的责任,更大覆盖面和保障面的税收规模,更加繁复平衡的管制结构。政府在制定自己的税收制度体系,利用政治权力在内的公共权力干预收入再分配的时候,要着眼实际,考虑千差万别的个体偏好,要考虑贫富阶层对利益效用的感受差别,在边际效用递减的情况下,政府的再分配资源应该优先向社会弱势群体和“敏感阶层”流动。再分配的功能尽量由中央政府承担,地方政府则更多地承担经济发展的职能。

## [参 考 文 献]

- [1] 韦农·波格丹诺. 布莱克维尔政治制度百科全书[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
- [2] 罗伯特·B·登哈特. 公共组织理论[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13.
- [3] 罗伯特·D·帕特南. 独自打保龄:美国社会资本的衰落与复兴[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 [4] 丹尼尔·罗杰斯. 共和主义:概念之旅. 载 应奇、刘训练. 共和的黄昏: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和共和主义[M]. 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25.
- [5] 詹姆斯·布坎南、戈登·塔洛克. 同意的计算:立宪民主的逻辑基础[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 [6] 戈登·塔洛克. 贫富与政治[M]. 长春:长春出版社,2006. 戈登·塔洛克. 收入再分配的经济[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 [7] 安东尼·唐斯. 民主的经济理论[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 [8] 道格拉斯·C·诺斯. 交易费用政治学[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2-3.
- [9] T·佩尔森、G·塔贝里尼. 政治经济学:对经济政策的解释[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11.

- [10] 杰佛瑞·布伦南、詹姆斯·布坎南. 宪政经济学[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1.
- [11] 尼古拉斯·亨利. 公共行政与公共事务.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2: 316—318.
- [12] 艾伯特·O·赫希曼. 转变参与: 私人利益与公共行动[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3.
- [13] 赫伯特·西蒙. 基于实践的微观经济学[M]. 上海: 格致出版社, 2009: 42—50.
- [14] Philip Pettit. “Legitimacy and Justice in Republican Perspective”, Inaugural Quain Lecture in Jurisprudence, 2012, in Current Legal Problems, Vol 65, 2012.
- [15] 戴维·奥斯本、特德·盖布勒. 改革政府: 企业家精神如何改革着公共部门[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 戴维·奥斯本、普拉斯特里克. 政府改革手册: 战略与工具[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 [16] 珍妮特·V·登哈特、罗伯特·B·登哈特. 新公共服务: 服务, 而不是掌舵[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79.
- [17] 罗伯特·B·登哈特. 公共组织理论[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135.
- [18] 昆廷·斯金纳. 共和主义的政治自由思想[M]//载应奇、刘训练. 公民共和主义.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6: 73.
- [19] 菲利普·库珀. 合同制治理: 公共管理者面临的挑战与机遇[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7.
- [20] Robert Charles Blitt. Who will watch the watchdogs, dissertation of PHD, University of Toronto, 2003.
- [21] Mathew Jason Hirschland. Assessing the private governance of public goods, dissertation of PHD, University of Colorado, 2003.
- [22] 文森特·奥斯特罗姆. 复合共和制的政治理论[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1996: 124.
- [23] 罗伯特·L·海尔布罗纳、威廉·米尔博格. 经济社会的起源[M]. 上海: 格致出版社, 2010: 95.
- [24] 西塞罗. 西塞罗文集. 论义务[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0: 336.
- [25] 菲利普·佩迪特. 共和主义: 一种关于自由与政府的理论[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 38.

(责任编辑: 谢光前)

## Reflection and Claim of Republican Tradition on Hypothesis of Economic Man

WAN Shao-hong

(School of Marxism, 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Nanchang 330013, China)

**Abstract:** Hypothesis of Economic Man holds that both individuals and 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are rational ones and economic animals chasing private interests and maximization of personal profit. This hypothesis results in political apathy, public power corruption and market disorder. Republicanism against the invasion of the political field by Economic Man Hypothesis ponders on the reasonability of Economic Man Hypothesis and its common disaster problem. Republicanism advocates surpassing the economic man and developing a responsible government. On the basis of Economic Man Hypothesis, Republicanism advocates a society of cooperation and consultation in which the public take part in politics actively and the government actively responds to people's preferences. Republicanism distinguishes the type of public goods and public services and claims that the market mechanism and government power should be combined with each other to promote the supply of public goods and guarantee the social equality and justice.

**Key words:** Hypothesis of Economic Man; Republicanism; Political Man; Public Goods Supply; Public Interests

